

# 伊朗新总统：美伊和谈的转机与挑战

“除了核问题，鲁哈尼在伊朗复杂的政治系统中，如何获得政治权威，也将是个挑战。”

记者 邹珊



8月3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左三）将新一任总统任命书授予鲁哈尼（右三）

8月3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正式批准哈桑·鲁哈尼为伊朗新一任总统。次日，在伊朗议会的第11任总统就职仪式上，鲁哈尼正式宣誓就职。

一份新内阁任命名单随着鲁哈尼的登台而提交。这份名单中，外交部长的提名成为关注焦点。鲁哈尼指定了原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为新任外长。这位职业外交官是公认的“资深美国政治家”，他拥有美国丹佛大学的国际法与政策学博士学位，英文流利；2003至2005年时曾任伊朗核谈判团队成员，当时的首席谈判代表就是鲁哈尼。

虽然由保守派控制的伊朗议会还未对名单做出批示，但通过这项任命，这位在参选时就曾表示将远离极端主义的新总统，进一步证明了自己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决心。“任命扎里夫为新外交部长，对于美伊间的和谈意义重大。”纽约“新学院”大学国际事务专家奥唐奈(Thomas W. O'Donnell)告诉本刊，“扎里夫对美国以及在美的伊朗反对派人士都非常熟悉。在这些反对派人士眼中，他与一般的德黑兰领导人不同，是个更为

理性的自由人士。”

如今，摆在新总统面前的公认难题有三个：应对经济制裁、缓与西方世界的紧张关系和打破核谈判僵局。因为，近两年来，欧美主导的经济制裁使伊朗石油收入每年减少数百亿美元，当地货币贬值严重，通货膨胀超过30%，部分地区失业率高于20%，民众生活受到了严重冲击。6月中旬，鲁哈尼因坚持走温和的中间路线而从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眼下，从伊朗民众到各方观察家，对于他“从外向内”地解决伊朗民生困境的执政方向都抱有很大希望。

“我认为，哈鲁尼作为前首席核谈判代表，将会寻求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展开‘互动’，并尝试就核问题与国际社会达成一定的协议。”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外交政策学教授卢卡斯(Scott Lucas)告诉本刊，“伊朗去年在谈判桌上提议，作为放松制裁的交换，将会以纯度为5%的浓缩铀来替代纯度为20%的浓缩铀。如今看来，德黑兰或有望在今年秋天继续落实这一提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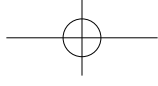
但是，就在鲁哈尼即将上任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制裁议案，寻求进一步

遏制伊朗的石油出口，以此迫使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有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每日石油出口若再减少100万桶，其石油收入将所剩无几。“核问题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德黑兰，而是来自美国。今年2月以来，华盛顿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力度。美国政府究竟是衷心想与伊朗达成协议，还是致其经济崩溃？我想起政府内部存在多种推行不同的目标派系。”卢卡斯说。

而在奥唐奈看来，鲁哈尼的登台的确改善了美伊关系出现破冰的主观条件，但启动协商的客观环境依旧不容乐观。“对于美国而言，若石油制裁最终解除，伊朗将会成为石油生产大国，在能源市场上影响非凡。而在石油资源超过全球50%的海湾地区，它还有成为军事强国的潜能。美国和欧盟都无法信任一个强大的伊朗。作为沙特和其他国家的保护者，美国并未忘记曾经的科威特战争。然而，伊朗若终结核项目，则需美国保证永不试图干预其内政，并尊重伊朗成为地区强国的目标。所以，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作为客观存在依然不可无视。”

“但两国间也并非不存在共同利益。”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主席马修斯(Jessica Tuchman Mathews)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华盛顿和德黑兰都希望伊拉克与阿富汗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发展；希望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被击败，伊拉克在其现有的边界内正常维持国家运作；叙利亚内战结束；海湾地区局势更加稳定；毒品走私减少，尤其是阿富汗；它们也希望通过解除制裁来促成双方问题的协商和解决，为中东这块被战乱和经济衰退缠绕多年的土地，增添一些贸易活力。这些都是协商的基础。”

但是，“除了核问题，鲁哈尼在伊朗复杂的政治系统中，如何获得政治权威，也将是个挑战。尤其是外交政策。他在伊朗对叙利亚的政策处理上一定会遇到问题。只要德黑兰继续公开支持阿萨德政权，它就会被美国、欧洲国家、土耳其和中东大部分国家所孤立”。卢卡斯说。■



# 突尼斯：谁在威胁年轻的民主？

“突尼斯不一定步埃及的后尘，但是，该国的民主人士无疑正仍然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

记者 邹珊

近日，因为两起事件，突尼斯“复兴运动党”领导的政府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骤然加剧。7月26日，反对党领导人布拉米遭暗杀身亡。因怀疑是政治暗杀，大批示威者走上首都街头表示抗议。7月29日，8名特种部队士兵在临近阿尔及利亚边境的山区遭恐怖分子伏击身亡。在附近城镇，又有成千上万民众走上街头，许多示威者要求政府下台。

作为“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突尼斯的政治过渡期曾保持相对稳定，而如今，该国出现了与埃及颇为相似的动荡局势。随着世俗派政党力量的壮大，执政党“复兴运动”同穆兄会一样，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指责。在反政府示威者中，有一支自命为“反抗”(Tamarod)的组织，他们模仿了为罢黜穆尔西而收集民众签名，并组织街头示威活动的同名埃及组织。

“抗议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世俗左翼政治家之死，但后来，它表达的则是民众对突尼斯政治僵局和社会经济萧条的挫败感。”美国塔夫斯大学北非与中东历史学教授、中东研究项目主任罗伯茨(Hugh Roberts)告诉本刊，“由于其他党派的蓄意阻挠和破坏，复兴运动党始终未能将新宪法敲定并落实。这牵制了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精力和能力，其执政伙伴所能提供的援助又很有限。所以，对于期待失业率和社会公共服务条件在革命之后能够显著改善的突尼斯民众来说，目前的经济状况逐渐让他们忍无可忍。”

“埃及与突尼斯有两个具体相似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戈莱姆(Hafez Ghanem)也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首先，突尼斯社会的世俗派与伊斯兰派也呈两极分化的状态，其世俗派甚至更为活跃。他们对与行政机构的‘伊斯兰化’不满，并且认定，复兴运动党的长期目标是将突尼斯发展为伊斯兰主义国家。其次，由复兴运动党领导的突尼斯政府到目前为止，也未能有效地重振经济。”

在罗伯茨看来，这两项政坛隐患已经进入了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中。激进的萨拉非力量的壮大使突尼斯世俗派产生了被威胁感，而复兴运动党因担心将该组织逼上恐怖主义道路，不愿采取决断的镇压措施。这使得这个伊斯兰政党饱受世俗派诟病。突尼斯士兵被害后，世俗派的担忧达到了最大值，复兴运动党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许多抗议者提出了非常消极的要求，比如要求政府下台、解散议会等。但这些只会进一步削弱执政党的决策能力。

“‘反抗’终将致使各个世俗力量联合起来，继续对抗政府。如今的突尼斯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多方力量想要推翻其民主革命的成果。”罗伯茨说，“突尼斯一党独大的体制已被完全废除，军方也没有参政或强权镇压平民的意图；复兴运动党是与两个非伊斯兰政党以及技术官僚们共同执政，在新宪法起草过程中，它也向世俗派的意见做出了重要让步。这表明，突尼斯不一定步埃及的后尘，但是，该国的民主人士无疑仍然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他们能否克服自身党派带来的影响，通过协商达成一定的共识，来保卫他们亲

自带来的，尚且年轻的国家民主？”

近两个月，土耳其、埃及和突尼斯接连出现了政府危机，虽不是唯一原因，但伊斯兰政府与世俗力量的意识形态差异在三国的政局动荡起因中均占有一席之地。“虽然经历了‘阿拉伯之春’，但在北非地区，政府伊斯兰化的倾向都有所加重。”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劳伦斯(Jonathan Laurence)告诉本刊，“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萨拉非派和与极端主义相关的基地组织四处发起攻击，而执政党派则是激进的萨拉非派的反对力量。从这个角度看，‘意识形态地盘战’对于国家安全来说是必要的。”

“但是，这些政府在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宗教地位垄断，不仅将非暴力宗教组织阻挡在了体制之外，也削弱了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劳伦斯进而说，“结果就是，一些影响非常广泛的宗教团体，如今只能在与法治完全脱离的某个领域发挥作用，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不到认可。而如果新政权不能在宗教领域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政策，那么，社会变革迟早会让他们知道，他们不配长期拥有这些权利。”



7月26日，突尼斯反对党领袖布拉米遭暗杀身亡后，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